國立清華大學 圖書館 81.8.25 LIBRA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
551.5
8635/2

反資本主義的心境

米塞斯／著◆夏道平／譯

自由主義名著譯叢③
反資本主義的心境

原 書 名／*The Anti-Capitalistic Mentality*
作　　者／Ludwig von Mises
譯　　者／夏道平
責任編輯／彭春美

發 行 人／王榮文
出 版 者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 7 樓之 5
郵撥／0189456-1　電話／(02) 392-3707
傳眞號碼／341-0760

發行代理／信報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 396-5912　傳眞號碼／397-1913
印　　刷／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排　　版／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□ 1991 (民 80) 年 3 月 1 日　初版一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
售價 125 元 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ISBN 957-32-1087-8

第 4 章
從非經濟的觀點反對資本主義

一、關於幸福問題的理論

攻擊資本主義的人們，常常這樣講：有了汽車、電視、冰箱，並不能使人幸福，而這些東西還有許多人不能享受。這兩點都是對的，但這並沒有打擊到社會合作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身上。

人們之辛苦勤勞，並不是爲的十全十美的幸福，而是要盡可能地消除某些不舒適，因而可以生活得比以前快樂一點。某人購買一具電視機，正由於他覺得這個玩意兒可以增加他的享受，使他比沒有這個玩意兒的時候較爲快樂。如果不是如此的話，他就不會買它。醫生的工作不在使病人快樂，而在於爲病人解除苦痛。苦痛消除了，才可好好地追求人生幸福，才可以抵抗那些爲害於人生的一切因素。

我們知道，在佛教的托缽僧當中（托缽僧靠別人施捨點殘羹冷炙而生活），有些人確實是自得其樂而不羨妒他人富有的。但是，這樣的生活，究竟不是大多數人所可忍受的。大多數人總是不斷想改善生活環境，增加享受。誰想以一個亞洲的乞丐作爲美國普通人的生活榜樣呢？例如，資本主義最大成就之一，就是幼童死亡率大大降低。幼童死亡是做父母的最痛心的事故。資本主義這一成就，誰能否認它消除了許多

人的痛苦呢?

至於說，技術與醫藥上的發明並不有利於所有的人，因而攻擊資本主義，這也是沒有道理的。人類生活情況的改善，總是由智慧最高而精力最充沛的少數人領先的，其餘的一般大衆漸漸地跟著上來。新發明的東西，一開始只是少數人的奢侈品，漸漸地，一般人也可以購買得起了。鞋子與餐叉的使用，也是慢慢地推廣的。即使在今天，世界上還有很多人沒有使用過這兩樣東西，那麼，我們因此對鞋、叉的使用表示反對嗎? 肥皂，現已大量生產，一般人都可享受。我們知道，開始使用肥皂的那些濶人，是促進肥皂大量生產的先軀。今天，如果那些買得起電視機的人們，因爲有些人買不起而不買，那麼，更是妨礙電視機的平民化，而不是促進它平民化。❶

二、物質主義

此外，有些人罵資本主義爲卑鄙的物質主義。他們對於資本主義之改善人類物質環境，不得不承認；但是，他們又說，資本主義使人類不再去追求高尚的目的了。它使人腦滿腸肥，而靈魂與心智卻爲之空虛；藝術水準一落千丈；偉大的詩人、畫家、彫刻家、建築家，再也不能產生了。我們這個時代只產生此流俗平庸

附庸風雅的人，總是很多的。他們假裝有鑑賞力，對於古代的藝術品表示特別愛好，對於同時代的藝術家則毫不同情。虛僞地推崇古人，就是貶抑那些違背傳統法則而另創格局的新進。

約翰·拉斯金（John Ruskin）——喀萊爾（Carlyle）、韋伯夫婦、蕭伯納（Bernard Shaw）等等也是如此——是爲英國自由、文明與繁榮掘墳墓的人。他歌頌戰爭與流血，對於他所不懂的政治學，則妄肆批評，固執地詆毀市場經濟，而一味迷戀已往的行會制度。他崇拜古代的藝術家，但對於現代大藝術家喜斯勒(Whistler)的作品，則用卑鄙的詞句來侮辱，以致被告到法庭而以誹謗定罪。資本主義不僅是個壞的經濟制度，簡直是以醜惡代替美好、以渺小代替偉大、以垃圾代替藝術。這種偏見的普偏化，是得力於拉斯金所寫的那些東西。

藝術作品的欣賞，本來是仁者見仁、智者見智的。因此，關於資本主義下藝術低劣的謬見，我們不可能用實證的方法或邏輯的推理來駁斥。然而，我們敢於說，資本主義時代藝術方面的輝煌成就，凡是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加以藐視。

在這個「卑鄙而營利的資本主義」時代，音樂方面卻有高超的藝術表現。華格納(Wagner)與浮地(Verdi)、伯里歐滋(Berlioz)與比才(Bizet)、布拉姆斯(Brahms)與布刺克魯(Bruchner)、吳爾夫(Hugo Wolf)

的小說，和許多大詩人如囂俄(Victor Hugo)、惠特曼(Walt Whitman)、里爾克(Rilke)、夏芝(Yeats)等的詩篇。如果沒有這些傑出的人才，我們的生活該是多麼貧乏啊！

我們不要忘記法國的一些繪畫家和彫刻家，他們教我們若干新的方法來觀察世界，來欣賞色和光。

這個時代，各部門的科學都有很大的進步，這是大家所公認的。但是，有些人又這樣怨言：這些進步，主要的是專家們的成就，至於「整合」(synthesis)的工作，則是缺乏的。我們要問：現代數學、物理學、生物學的造詣，是沒有人可以抹殺的，那麼，像克洛齊(Croce)、伯格森(Bergson)、胡士爾(Husserl)、懷德海(Whitehead)這些哲學家的著作，又如何呢？

每個時代，藝術的造詣方面，都有它自己的特色，對於古代名作的摹倣，不算是藝術。藝術品之有價值，在乎有不同於衆的特色。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時代風格。

頌揚古代的人，有一點似乎是對的，這是就建築方面來講。過去幾個世代，確實沒有留下來像金字塔、希臘寺院、哥德式的教堂、文藝復興時代的宮殿等那樣偉大的紀念物。在近代一兩百年當中，固然也建造了一些教堂、宮殿、學校、圖書館，但這些建築都缺乏創意的表現，只是些老的式樣，或把一些老式樣加以揉雜而已。我們這個時代的建築風格，只見之於大規模的公寓、政府大廈，和私人住宅。瞧不起紐約摩天樓，固然是有點迂氣，但是我們也得承認，現代的建築確實比不上古代。古代建築有其特別優異的地方。

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就宗教的建築來講，宗教的高度保守性是不容許任何革新的。至於大宮殿的建築，則又隨王朝與貴族的消滅而不再

有。企業家與資本家，無論反資本主義的人怎樣詆毀他們，他們的財富決不會像國王貴族們那樣，用之於窮奢極侈的建築方面。今天，也沒有一個人有足夠的財富可以興建像凡爾賽(Versailles)、或厄斯科立阿爾(Escorial)那樣的皇宮。以前的專制君王們，只要他們所眷顧的藝術家，能夠繪出建築圖案而爲他們所歡喜，縱令是勞民傷財的大浪費，他們也可不顧輿論而下令興工。像這樣的事，現在已不會再有了。多數人的會議，不會輕於採納一兩個創意者的大膽設計。他們不能不顧及當時的輿論。

大多數人對於當代的藝術不會有公平的評品，這一現象，古今皆然。對於當代大作家和大藝術家表示敬重的，常常是限於少數人。大衆的情趣卑劣，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特點。資本主義的特點，倒是在於如此的事實，即：資本主義提高了大衆的生活水準，因而大衆也成了文藝——自然是低級文藝——的消費者。於是，書刊市場上就爲他們湧出了許許多多卑劣的作品。但是，這種情形並不妨害大作家們創造不朽的作品。

有些批評者對於他們所謂工業藝術的低落感慨唏噓。他們常把那些藏在歐洲貴族的碉堡和博物院中的名貴家具，與大規模生產出來的便宜貨比較。但是他們竟沒有想到，那些被收藏的東西只是供少數富貴人家享受的。精緻彫刻的箱籠，嵌著玉石的椅桌，在較窮階層的小屋子裏面是找不著的。對於美國工人家中的便宜家具還認爲不好的那些人，應該渡過格蘭特河(Rio Grande del Norte)，去看看墨西哥奴僕們毫無家具的住宅。現代的工業，當它開始供給大衆的家具，以提高大衆生活水準的時候，工業家所最注意的，是盡可能生產便宜的東西而顧不到美術的價值。後來，資本主義已經提高了大衆的生活水準，工

業家就漸漸地製造些精緻而美觀的東西出來。在資本主義國家中，生活在優美環境當中的人們，一天多似一天。這個事實，只有深懷成見的人纔會漠視。

三、不公道

對於資本主義最動情感的攻擊者，就是那些罵資本主義不合公道的人。

實際的宇宙，有其不變的法則。凡是與這些法則相反的念頭都是幻想。幻想，只要止於幻想，倒也沒有甚麼害處。但是，一旦到了幻想者閉著眼不顧事實的時候，那就嚴重地妨礙了人類爲改善物質生活的努力。

一切幻想中最壞的一個幻想，就是以爲「自然」曾經賜予每個人以某些權利。照這種說法，自然是慷慨的，對於每一個人都有施與。因此，每個人在人羣中，或者說在社會裏，各有應得的那一份權利；而這份權利是自然分派給他的。自然的永恆法則與神聖的公道觀念，不許任何人把自然賦予他人的東西據爲私有。窮人之所以窮困，只是因爲一些不講公道的人剝奪了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。防止這種剝奪，須使得所有的人都富有，這是宗教與政府當局的任務。

這種說法，每個字都是虛妄的。自然並不慷慨，相反地，它是吝

賞賜。

把這種財富的「分配」，取決於所謂神聖的或自然的公道觀念，實在是荒謬。照這種幻想，自然爲人類提供了一項基金，每個人應該從中取得一份。這是何等的無稽之談！事實上，分配問題是社會制度的問題。我們所應研究的，是怎樣的分配制度才能夠繼續生產、擴大生產，生產大家所需要的東西。

基督教的世界總會(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)一九四八年的宣言曾經這樣講：「公道的要求，例如，亞非兩洲的人民應該有更多的機器生產，以增進福利。」❷這句話的含義是說，上帝給了人類一定量的機器，並且希望這些機器平均地分配給各個國家。可是資本主義國家太壞了，它們據爲己有的，已超過了「公道」所攤派的，也即是把亞洲國家應得的部分剝奪去了。無恥！

事實上，資本的累積與投資於機器(這是西方國家比較富裕的根源)，完全是資本主義、不受干擾的資本主義的功效。上述的教會宣言，則對這樣的資本主義妄加曲解，並以道德爲理由加以攻擊。資本主義的意理與政策，本可以使亞非國家進化到資本主義階段；亞非國家的經濟落後，是因爲不接受這種意理，不採用這種政策，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罪過。

亞非國家不僅不採用資本主義的意理與政策，他們還反對外國人的投資，殊不知外人投資正是使他們「享有更多的機器生產」。亞非國

在生產額中實質上所貢獻的分額，可以用一般的勞動生產力來測定。這完全是個幻想。假如有一個人用把剪刀裁開一張紙，在這裁紙的成績中，我們怎樣確定這個剪刀或剪刀的每一片佔多少分額，這個用剪刀的人又佔多少分額?

製造一部汽車，需要各種工具與機器、需要各種原料、需要各種工人的勞動，尤其需要一個設計者的計劃。這些生產因素的合作，是製造一部汽車所必要的。但是，沒有人可以確定，在一部製成的汽車中，每個生產因素所貢獻的分額各有多少。

爲著方便討論起見，暫時撇開一般人對於這個問題的一切謬見。我們只問：勞動與資本這兩個生產因素，那一個使生產增加? 如果問題是這樣正確地提出的話，答案必須是：資本。今天，美國的生產額（就僱用中的每個工人來講）比較以前的時代，或者比較今天經濟落後的國家——例如中國——要高得多。這是因爲，美國現在的工人有更多和更好的工具在幫助他生產。如果資本設備（就每個工人而言）不比三百年以前爲多，或者不比今日的中國爲多，那麼，今天美國的生產額（就每個工人而言）也就不會比較高了。

不增僱工人，而可以增加工業上的生產總額，那就必須有新的儲蓄，使資本累積起來而有新的投資。勞動生產力之所以能夠倍增，就得力於這種新的儲蓄與投資。

由於資本不斷地累積，生產總額也就不斷地增加。在這續漲增高的生產總額中，工資率——工資所得者的分配額，也就續漲增高。何以會如此呢? 因爲資本累積率超過人口的增加率。對於這個事實，政府方面是默而不言，甚至還要鄭重否認。但是從工會的政策看來，則很明顯地可以看出，工會的領袖們是充分懂得的。因爲他們主張反移民法，想把全國找工作的人數限制住，同時在每個地方性的勞動市場，他們也想限制新人進來。可是，這些工會領袖們，儘管內心上完全了解工資率增高的原因所在，而他們反要把我們所講的這個理論公開地加以侮辱，說是爲卑鄙的布爾喬亞階級作辯護。

工資率的提高，不是靠各個工人的生產力，所靠的是「邊際的」勞動生產力。此所以個人的生產力雖毫無變動，而其工資率也會上漲。

像這樣的職業，有的是。現在的理髮匠與兩百年以前的理髮匠，同樣地爲人理髮。今天在英國首相餐桌旁邊的侍者，與當時在皮特(Pitt)、帕爾麥斯吞(Palmerston)餐桌旁邊的侍者，同樣是伺候人。在農業方面，現在還有幾樣工作仍舊使用幾百年以前的那些工具。然而，這些工作者今天所賺得的工資率遠比以前的爲高。其所以如此，是因爲工資率是決定於邊際的勞動生產力。就僱用侍者這個事例來講，僱用一個人做侍者，卽是不讓這個人被僱於生產部門。所以僱主給一個侍者的工資，必須等於生產部門多僱一個人所可增加的產額。所以，這個侍者的工資之所以高漲，其原因並不在侍者方面，而是因爲投資的增加超過了工人人數的增加。

所有蔑視儲蓄與資本累積的冒牌經濟理論，都是荒謬的。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比非資本主義社會富裕，就是前者比後者有較多的資本財可以利用。

工資所得者的生活水準之得以提高，是由於資本設備，相對於工人人數而言，曾經增加，所以，在生產總額中續漲增高的那一部分，總是歸於工資所得者。

只有一個方法可以不斷地提高工資率，使工資所得者受惠——這就是使資本加速地增加，超過人口的增加率而增加。這種說法，誰也

不能指出一點弱點出來。如果這就是「不公道」，那只好怨天而不能尤人。

四、自由與社會主義

一部西方文明史，是一部爲著自由而不斷鬥爭的記錄。

人們爲生存而奮鬥，爲改善物質環境、增進福利而努力。他們奮鬥與努力之得以有成就，根本的、唯一的原因，是在分工之下的社會合作。但是，社會和平生活的維持必須藉助於法制，否則無以防止刁悍之徒的搗亂，於是就有了國家與政府。可是，有了國家與政府之後，問題又來了；即是要防止政府當局或官吏濫用權力，使其不能把人民變成事實上的奴隸。所有爭自由的鬥爭，其目的就在於把政府官吏與軍警的權力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以內，使其不能任意地爲害人民。個人自由在政治上的意義，也就在此。

自由這個觀念，可說是西方所特有的。東方與西方的分別，最重要的一點，就在於東方人的腦子中從來沒有像西方那樣的自由觀念。古代希臘人之所以永久光榮，就因爲他們對於保證自由的那些法制，首先理解其意義。在科學方面，有些原始的貢獻，以前是歸功於希臘人的，據最近歷史學家的研究，實在是溯源於東方。但是，關於自由觀念之起源，是始於古代希臘城市國家，卻從來沒有人爭辯。希臘哲學家、歷史家的著作，把自由觀念傳給羅馬人，後來又傳給現代的歐美。於是它就成爲建立西方良好社會的主要基石。它孕育了放任哲學，而放任哲學引導出資本主義時代一切空前的成就。

現代的一切政治制度，都是要保障個人自由，以防止來自政府方面的侵害。

代議政治與法治、司法獨立——法庭不受行政部門的干涉、人身保護狀(habeas corpus)、司法檢查與行政救濟、言論與出版自由、政教分立以及其他許多法制，所爲的目的只是一個，即：防止政府官吏胡作妄爲，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。

資本主義時代，農奴與奴隸的痕跡，徹底消失了；慘無人道的酷刑已經終止，刑罰已減至僅夠防止犯罪行爲所必要的程度；對於嫌疑犯，已不再用苦刑或其他可遭非議的方法去逼供；一切特權都已取消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；人民已從君主的屬下變成了自由公民。

物質生活的改善，是這些政治改革與更新的結果。因爲一切特權都消失了。每個人都有權利向他人的既得利益挑戰。於是聰明才智之士得以放手作爲，發展新興工業，使大衆的物質生活更爲滿足。人口增加，但增加了的人口，仍能夠享受比他們祖先更優裕的生活。

在西方文明的國家，雖也有人曾經主張專制政治——對內絕對的君權或貴族政治，對外征服其他民族。但到了啓蒙時期，這種聲音漸漸微弱了，起而代之的是自由主義。自由主義在十九世紀初期似乎是個不可抵抗的潮流。大多數的哲學家與歷史家，都以爲歷史的進化是趨向於自由制度的確立，任何陰謀與詭計都阻擋不住。

談到自由主義的社學哲學，大家往往忽略了一個有助於自由觀念成長的重要因素，這個因素即希臘時代的著作。在希臘時代的學者當中，固然也有主張萬能政府的，像柏拉圖這樣的人；但是希臘意理的要點，還是在追求自由。以現代的政治組織作標準，來看希臘的城市國家，它們當然是寡頭政治。希臘的政治家、哲學家和歷史家讚美爲至寶的自由，只是少數人所享有的特權。住在希臘城市的外國人與奴隸，是沒有自由可享的。讚美自由的那些人，實際上是擁護世襲的寡

頭政治。雖然如此，我們決不能以爲他們之讚美自由是虛僞的。如果我們這樣想，那就大錯而特錯。事實上，他們對於自由的歌頌與追求，其熱忱並不減於兩千年後、在美國獨立宣言上簽字的那些蓄奴的人們。後來，各國的孟拉科馬克(Monarchomachs)的觀念❹、英國民權黨的宗旨、亞爾佐休士(Althusius)、格老秀斯(Grotius)、洛克(John Locke)等人的學說，以及一些現代憲法與人權清單起草人的意理，都是從希臘時代的政治思想產生出來的。在斯圖亞特王朝(the Stuarts)的英國、波旁王朝(the Bourbons)的法國，以及被一羣專制君主所統治的意大利，能夠使自由精神爲之覺醒的，也靠的是希臘思想的傳習。甚至在腓德烈·威廉第三(Frederick William III)的普魯士大學的文預科，以希臘羅馬的文學爲基本教材的教育，也成了共和主義的堡壘。對於這一事實，俾斯麥曾經作證❺。俾斯麥是十九世紀當中，僅次於梅特涅(Metternich)的自由主義的大敵人。他把學校課程中含有自由教育的古典課程一律刪除，這又說明奴役思想的復活。

一百年以前，能預料到反自由的觀念註定地要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佔有優勢的，只有極少數人。當時，自由理想似乎深植於人心，不是任何反動力量所可根絕，誰也不敢公開地反對自由、直率地鼓吹反動。但是，反自由主義者卻可在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、計劃經濟的掩飾下，把人們的思想引入自由的歧途。

精明的人不會看不出，社會主義者、共產黨徒，和主張計劃的人，都是想消滅個人自由、建立萬能政府的。可是，大多數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卻以爲，他們是爲自由而努力於社會主義之實現。他們把自己稱之爲左翼民主人士，現在，他們甚至也冒稱「自由主義者」。

這些知識分子和其附和者的心理因素，我們曾經解析過。他們有

志未遂，是由於自己的缺點。這一事實，在下意識裏他們完全知道。他們知道，這是由於自己的不夠聰明，或者是不夠努力。

他們雖然知道這一事實，但他們不願明白承認自己的劣點，而要找一個替罪的羔羊；於是，就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社會經濟組織的不公平。他們以此自安自慰，並且教別人也如此相信。他們宣稱，在資本主義下，只有極少數人可以自我實現。「在自由放任的社會中，只有少數富人才可享有自由」❻。因此，他們的結論就是，政府爲實現「社會公平」，必須採取干涉政策。他們所說的「社會公平」，實在的意義是說，「按照各人所需」將財貨給與不幸的大衆。

如果社會主義的問題，只是言論上爭辯的問題，而未證之於實驗，那麼，缺乏明確的了解與判斷的人迷信社會主義，以爲社會主義制度下，自由還可以保存，那還情有可原。但是，自從有了蘇俄的經驗，每個人都知道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情形以後，再也不應該自欺欺人去信奉社會主義。

今天，社會主義的信徒們，當他們想使別人相信社會主義無害於自由的時候，他們不得不歪曲事實，並曲解文字的眞意。

已故的拉斯基教授(Professor Laski)——英國工黨的黨員，曾任該黨主席，他自以爲是「非共」甚至是「反共」的——曾經講過：「無疑地，一個蘇俄的共產黨員對於自由有充分的感覺；同樣無疑地，他很敏銳地感覺到，在法西斯的意大利是沒有自由的。」❼事實上，一個俄國人只有服從命令的自由，如果他的行爲與上級的命令稍稍發生一點偏差，他就受到無情的清算。所有那些被清算的政客、官吏、作家、音樂家、科學家們，不僅都不是反共的，而且都是些狂熱的共黨主義者，因爲忠於蘇維埃的教條，獲上級提拔，在黨內已有很高的地位。

他們所犯的過錯，只是沒有很快地修改他們的觀念、政策、書籍、或論文，以適應史達林的心血來潮而已。如果我們不把「自由」一詞的意義加以曲解，那麼，我們就很難相信這般人對於自由有充分的感覺。

法西斯的意大利，是一個沒有自由的國家。它抄襲了蘇維埃的花樣，一黨專政，因而對於不同的意見一概加以壓迫。但是，關於一黨專政這一原則的實施，在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之間，也有一點顯著的不同，例如，在法西斯的意大利，以前曾任國會議員的共產黨員葛累遮底教授(Professor Antonio Graziadei)，至死是個固執的共產主義者，但他還能生存於意大利，並且以退休教授的名義領受政府所發的年金，同時他也可以自由著述，交由第一流的出版公司出版。拉斯基教授說俄國的共產黨員「無疑地對於自由有充分的感覺」，其實，像葛累遮底在意大利所感覺的不自由，終究不如俄國共產黨員所感覺的那麼厲害。

拉斯基每每喜歡講：自由的實際意義是法律之內的自由。他再進一步地說，法律的目的，在於「保障國家統治者所認爲滿意的生活方式」❽。如果這句話可以解釋爲法律的作用是在維持社會安寧，防止叛徒們煽動內戰以武力推翻政府，那麼，以這句話來描寫自由國家的法律，這是對的。可是，拉斯基又說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，「窮人用激烈的手段來改變富人的財產權，那就馬上會推翻整個的自由制度」❾。這句話，他卻講錯了。

我們以拉斯基和他的朋友們所崇拜的大偶像——馬克斯來講吧。在一八四八與一八四九年的時候，馬克斯積極地從事革命組織與革命行動，起先是在普魯士，後來也在德意志的其他各邦活動，從法律上講，他是一個外國人，於是乎被驅出境，帶著妻子兒女和僕人，搬到巴黎，後又轉到倫敦。❿嗣後，動亂平靜，革命的煽動者都被大赦，

他獲得允許可以自由地回到德意志的各邦，他也常常回去。此後，他再也不是一個亡命之徒了，他由於自己的意願，選擇倫敦作爲住家。⓫一八六四年，當他組織國際工人協會(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's Association)的時候，並沒有受到任何人的干擾。這個協會，照它所公開宣稱的唯一目的，就是在準備世界大革命。當他爲這個協會到歐陸各國去活動的時候，並沒有被阻止。他很自由地寫作、發行。而他所寫作發行的書籍和論文，如用拉斯基所說的詞句，那確實是努力於「用激烈的手段來改變富人的財產權。」可是，馬克斯畢竟能夠於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在倫敦梅蘭公園路(Maitland Park Road)十四號的家宅內安安靜靜地死去。

或者就英國的工黨來講，他們努力於「用激烈的手段來改變富人的財產權」，也沒有受到與自由原則不相容的任何行動的阻礙。這是拉斯基知道得很清楚的。

馬克斯，這個造反的人，可以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，自由自在地生活、寫作、鼓吹革命，正同維多利亞時代以後的工黨可以自由自在地從事政治活動。可是，蘇俄的政府對於最輕微的反對也不能容忍。這就是自由與奴役的區別。

五、自由與西方文明

自由在法律上與憲法上的觀念，以及爲實現自由而設計的制度，常常受人批評。這些批評者所持的理由，有一點是對的。他們說，不受官吏專橫之害，這件事的本身尚不足以構成個人自由。但是，他們爲強調這一眞理，卻又走到一個錯誤的地步——反對開放政策。

自由主義者從來不以爲限制了官吏們的專橫即是個人自由的充足

條件。要使個人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充分自由，必須藉助於市場經濟的運作。憲法與人權清單等等並不能創造自由，個人自由是競爭的經濟制度所賜予，憲法與人權清單等不過使這些自由得有保障，防止行政權力的侵害而已。

在市場經濟下，大家都有機會爲他們理想中的前程而努力。分工競業，各有選擇職業的自由。這種自由，在計劃經濟下是不存在的。計劃經濟是由官方決定每個人的職業。每個人社會地位的升降，決定於上級的意旨，個人的前途，完全靠權力者的眷寵。

但是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，每個人都可自由地向他人的既得利益挑戰。如果他覺得，他有能力以價更廉、物更美的產品在市場競爭，他就可以試顯身手。資金缺乏並不妨礙他的企圖，因爲資本家經常是在尋找善於利用資金的企業家。工商業活動的成敗興衰，靠的是消費者的選擇；爭取消費者，靠的是價廉物美。

在資本主義制度下，工資所得者也不受僱主的任意支配。一個企業家，如果僱不到最合適的員工，或者不能以足夠的工資防止他們轉業，那麼，營業的純利就會減少。僱主與受僱者之間，無所謂恩惠。僱主僱用員工，同購置原料與設備一樣，是營業上必要的手段。員工方面也可自由選擇最適合於自己的工作。

這種決定個人地位與所得的社會淘汰，在市場經濟下不斷地進行。一方面，有些巨富日漸衰落，最後化爲烏有；另一方面，有些貧賤出身的人物，地位與財富一天一天顯赫起來。

在資本主義社會裏，沒有特權階級；政府對於既得利益，並不給予特殊保護，任憑後起之秀向它們挑戰。在這種社會裏，已經致富的人，爲保持財富，仍須努力不懈，與他人競爭。

在分工合作的社會架構裏面，每個人都要靠他自己對於購買者羣所提供的勞務，而他自己也是購買者羣當中的一個人。

每個人，當其購買或不購買的時候，就是一個最高權力的一分子。這一權力，指定了所有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。在這所有的人當中，自然也包括每個購買者和不買者在內。

某些人的所得較高，另一些人的所得較低。在這一分配過程中，每個購買者都是影響因素。每個人都可自由提出一種貢獻以換取較高的報酬。

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自由，就是：某甲依賴於別人的，並不多於別人之依賴於某甲。除此之外，可以說沒有其他的自由。生產分工，誰也不能完全自給。

我們之所以贊成資本主義、反對社會主義，主要的理由，還不在於社會主義必然地毀滅一切自由，把所有的人都置於權力者奴役之下。作爲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，事實上是不能實現的，因爲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，市場的功用消失了，任何經濟打算都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社會主義不能被看作一種社會經濟制度，它不但破壞了社會合作，而且帶來窮困與混亂。

談到自由問題，不一定涉及存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相對立的經濟問題。但我們必須指出，西方人之所以不同於亞洲人，完全是由於前者過的是自由生活。中國、日本、印度，以及近東的一些回教國家，在沒有接觸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前，他們並不是在野蠻狀態下生活。這些民族，在幾百年乃至幾千年以前，已經在工藝、建築、文學、哲學，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，有了輝煌的成績。他們也建立過強有力的帝國。但是，他們的努力一旦被阻，他們的文化就陷於麻痺

遲鈍的狀態，失掉了適應新的經濟問題的能力。他們的智力與藝術天才也爲之消失。藝術家與作者，赤裸裸地抄襲前人的格局。神學家、哲學家、法律家，也只以註釋古人的著作爲能事。他們祖先所創造的那些紀念物黯然無光，他們的帝國也已解體。他們的元氣與活力消失了，面對日益貧弱的趨勢而漠然無動於衷。

東方古代的哲學與詩篇，是可以與西方最好的作品比美的。可是在最近幾百年當中，東方人卻沒有任何重要的著作出現。在現代文化史的記錄上，難得找出東方作者的姓名。東方人對於人類文化久已沒有任何貢獻了。有許多問題與爭論，在西方曾經鬧得有聲有色，對於東方人則是陌生的。一方面是波瀾壯闊，一方面是死水一團。

理由是很明顯的。東方缺乏一件最重要的東西——相對於國家而言的自由的觀念。東方人從未舉起自由的旗幟，從未強調個人的權利以對抗統治者的權力，從未把專制君主的任意專斷當作問題來討論。因此，他們從未建立一個有效的法制以保障私人財產，防止暴君們隨意沒收。反之，大家總以爲富人之有財富就是窮人所以窮的原因，因而對於統治者之剝削工商界財富，反加讚許。所以大量的資本累積成爲不可能。因此，凡是需要大量投資的一切進步設施，這些國家都做不到。資產階級不發達，著作家、藝術家和發明家也就無所庇托以發展其天才。對於後生輩，所有發展個性的道路都阻塞了；剩下的只有一個，就是服侍統治者這一條路。西方社會是每個獨立的個人可以個別地力爭上游的個人社會；東方社會則是一羣臣民麕聚起來，靠著統治者的恩惠而過活的社會。西方活潑的青年把世界看作一個競技的場所，在這裡裏，他可以贏得盛名、地位、光榮，與財富；在他的野心之下，天下沒有太難的事。至於東方人，因其父母們都是遷就環境、

遵循傳統的，所以他們都養成了優柔謙卑的習性。自立自恃的西方人，那股得意洋洋的朝氣，表現出來，就像熱烈的讚美詩一樣，索福克麗茲(Sophocles)的安提娥尼讚美歌(Antigone-hymn)與貝多芬(Beethoven)的第九交響曲(Ninth Symphony)，就是這種氣概。這一類的音樂，是東方人所未曾有的。

西方文明的建造者，其子孫將捨棄自由而自願地投降於萬能政府的保護下，這是可能的嗎？由一個最高權力者，設計一具龐大的機器來運用，把人當作這具機器的螺絲釘，這樣的一個社會制度，他們會滿意嗎？停滯了的文明，其心理竟會對於那些犧牲了成千累萬的生命而爭得優勢的觀念，發生掃蕩作用嗎？

塔西佗(Tacitus)提到第庇留(Teiberius)時代羅馬人的時候，很悲傷地說道，他們都被奴役了。

註 釋

❶從新事物的發明到這種新事物的普遍使用，其時間的距離，可因資本主義的功用而縮短。關於這一點，參看第二章第一節。

❷參考 *The Church and the Disorder of Society,* New York, 1948, p. 198.

❸至於利潤一項，則不受影響，因爲利潤是來自生產因素的適當調整。僱用中的勞動與物質生產因素，常因供需變動而加以調整。企業家負起這種調整的任務，利潤是這種任務的報酬。利潤隨調整工作的告終而消滅。在理論上，利潤是一時的。但在事實上，由於供需變化不斷地發生，因而，來自調整工作的新利潤也不斷地出現。

❹孟拉科馬克(Monarchomachs)是十六世紀宗教戰爭時期，一羣不同教派、不同國籍

的作家。他們否認君主有使人民無條件服從的權力。他們有兩個目的，一、保障各別的宗教信仰以對抗宗教迫害，這一點，主要是在保護基督新教。二、他們認爲君主的權力不是直接來自上帝，而是經由人民間接獲得的，所以他們是支持人民主權的。這一羣作家的代表者，英國有 Ponet,Goodman；法國有 Hotman, Doneau 等。

❺參考：Bismarck, *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,* New York, 1898, Vol. II, p. 1.

❻參考：H. Laski, *Article Liberty in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* IX, p. 443.

❼同上 pp. 445-446.

❽同上 p. 446.

❾同上 p. 446.

❿關於馬克斯在一八四八、一八四九年的活動情形，參考：Karl Marx, *Chronik Seines Lebens in Einzeldaten,* Published by the Marx-Engels-Lenin-Institut in Moskau, 1934, pp. 43-81.

⓫一八四五年，馬克斯自願地放棄普魯士的公民資格。後來，在六十年代的前幾年，他又想在普魯士從事政治活動，但普魯士的政府拒絕了他恢復公民資格的請求。因此，他與實際政治斷絕關係，這一經過也許就是使他決心定居倫敦的一個原因。